

2113

酉阳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内部发行)



8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酉阳县委员会

酉阳县县志编修委员会

编

一九八三年九月印



目 录

缅怀烈士赵世炎·····	县党史办供稿 (1)
红三军司令部遗址——南腰界余家桶子 ·····	冉光大 (11)
红军在大坝场战役遗址——冉氏宗祠 ·····	王明友 冉光大 (15)
烈士邹杰简介·····	冉敬林 周名驹 (19)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宋克勤 (27)
龚滩解放前后纪略·····	罗子南 (40)
民国时期酉阳商业贸易概况 ·····	陈俊德 (45)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川陆运总队 ·····	陈懋英 (60)
解放前夕的同益盐号·····	田绍恩 (71)
酉阳鸦片烟害纪略·····	陈俊德 (86)
我所知道的酉阳袍哥·····	朱开宇 (97)
酉阳文坛简介·····	冉绍滨 周永年 (109)
我所知道的酉阳善堂·····	余 璞 (120)
别动队在酉阳的所作所为·····	陈子尚 (135)

缅怀烈士赵世炎

赵世炎同志是我党早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建立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卓越组织者，工人阶级武装起义的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日夜操劳以重整革命队伍的赵世炎同志，由于被叛徒的出卖，七月二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世炎同志住所）不幸被捕入龙华监狱，七月十九日凌晨慷慨就义于枫林桥畔，革命先辈壮烈牺牲，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潜写了光辉的篇章。

烈士热血洒龙华，五十五年过去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光荣传统，奋发努力，献身四化，这是我县各族人民和广大干部必须时刻牢记的。

一、世炎烈士的少年时期

赵世炎同志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三日（农历辛丑年二月十五日）生于四川省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巴罗赵家庄屋（今龙东公社八一大队）并在这里渡过了十五个春秋。

世炎同志的父亲是一个严谨的家长，对子女管教很严。母亲卢氏是在困苦环境中长大成人的孤女，善于操持家务，对子女很慈爱，特别是钟爱世炎、母亲教导子女，主张潜移默化

化，以身作则；不用体罚或强制法。世炎入学前，受母亲的感染较深，自幼习于勤劳，对人善于说服，对事耐心细致。

童年时，他听母亲讲“安安送米”的故事，幼小的心灵愤激于恶婆婆的封建淫威，失声痛哭，连呼“打死她，打死她！”

世炎同志一名国富，笔名施英。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四岁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稍长，读“四书”、“五经”。他性格开朗，活泼伶俐，读书很用功。幼年时，不仅敢于在大庭广众中毫不拘束地谈话，而且语言幽默，趣味横生。他有四兄三姐一妹，常在兄弟姐妹中运用古书上的语言写“诏书”给三姐世兰，使家庭时闻欢声笑语。他从小能寓学习于生活游戏，不仅有助于记忆文化知识，且为他敏锐地接受新事物奠定了基础。

他的二哥世珏，十五、六岁离家走向社会，后考入成都陆军学堂，加入了“同盟会”。当其有信到家，即或深夜，世炎亦闻讯起问：“喜乎？忧乎？”他三哥答：“喜”。世炎便欣喜而言：“善哉！善哉！”。幽默的语言表露出对奔波反清的兄长的牵挂。反清反帝革命运动爆发时，二哥在革命军中作一名下级军官，常把自己接受的一些新思想灌输给弟妹，从外地寄回一些介绍民族英雄的小册子，书面上写着“富弟效之”。世炎对这些书爱若珍宝，孜孜阅读。他看到二哥闹革命剪掉了头发，也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并顾盼自得地说：“前发齐眉，后发披肩，原是汉童的梳装，不能再效满奴。”那时，四川盛传端方率领新军入川，助赵尔丰屠杀川人。世炎的父亲赵敦之先生便告戒世炎说：“不准说满奴，满清再来了看你怎么办？”世炎即回答：“满奴何足畏

战。”

一九一二年，十二岁的世炎考入龙潭“两等小学堂”高等一班读书，学习非常用功，课外读了许多书。诸如《韩非子》，司马迁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以及《通鉴纲目》，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水浒传》、《三国演义》，唐诗宋词，翻译过来的《民约论》、《天演论》、《进化论》等等。旁征博览，哺育了世炎同志的秉笔千言，雄辩之才。高等一班同学中数世炎成绩最优，只有甘南引同学的成绩可与之媲美。世炎能写一手好字，又善绘画，他的字常为同学们当做字帖争相传抄，赞赏不已。

课外读物对世炎影响较大，他所喜好的是，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的慷慨悲歌，文天祥《正气歌》那种舍身为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凛然正气。这类作品饱含着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勇气概和大无畏精神。那时，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未结束，窃国大盗袁世凯打着“洪宪皇帝”的旗号复辟帝制，全国掀起了讨袁护国革命浪潮。两等学堂地理教员王勃山(同盟会员)，讲课中谈到清朝政府腐败，帝国主义侵华，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祖国大好河山支离破碎时，愤激痛哭，此情此景，震撼着世炎的少年心灵，使他听了怒目切齿，他在一篇作文中写到：“所谓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之权也”，以致怒撕明史洪承畴等《二臣传》。那时学校中提倡尊孔孟崇尧舜，世炎则引韩非子之说以非之。他在一篇《封第有辨说》的作文中写道：“象欲得舜之武器、乐器竟有杀兄之举，到了有舜之后，要夺取黎民财物，何凶恶毒辣方法之不可使？而舜不

考虑及此，竟以私情遗害黎民，岂是贤圣之君乎？孟子从而为之说，可见其平时说‘施仁政于民’，是欺人之说耳”。对此，国文教员在他的作文上批了“离经叛道”四个字。世炎又岂止离儒家之经，叛孔孟之道！二哥的一位好朋友席正平，是贵州革命军的一个领头人物，讨袁活动受挫时，乔装避难到赵家，三姐世兰、四哥世焜和世炎积极掩护了这位革命党人。动荡的时代，使人早早觉醒。书上的、现实的、环境的、切身的、诸多影响，使少年世炎激昂、愤发，胸中闪烁着民主革命的火花。

世炎喜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常与二、三同学或徘徊田塍，或泛舟河中，流连于雄山秀水之间，沉醉于胜景奇观之地，诵古人山水佳句，抒发心中倾慕激情，念念于兹，乐而忘返。

一九一四年，世炎在龙潭“两等学堂”高等一班毕业，考试名列优等，时年十四岁。由于他聪颖过人，家人和师友都对他的深造抱很大希望。那时，他的三哥世焜在济南电报局工作，使世炎有了到北京升学的机会。因此，世炎虽于次年春考取“酉属中学校”，但却未入校就学，而是一面在原校补习功课，一面兼任初级小学教员，一九一五年他三哥回家省亲，返济南时，世炎与三哥和四哥一起远离家乡去北京读书。

二、世炎烈士的中学时期

一九一五年八月，世炎同志和他的四哥世焜，得三哥世焜的资助。由家乡龙潭到了北京，考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附属中学”读书。附中的教师有“高师”的教授，有高师毕业的优秀生，也有从事研究教育的专家。世炎同志在这里受到了较好的教育。他在这个学术与民主空气俱浓的学校里，师生常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和新思想，认真攻读各门功课。他唱歌时的四川口音，引起同学嗤嗤笑语，但他不怕讥笑，毫不马虎地对待音乐课。当他的英语稍具有水平时，课外常读英文书报，并利用课余时间，常去找传教士查经和闲谈。有同学笑道：“你到教堂去找‘老毛子’，是不是想加入耶稣教？”他回答说“你知道什么叫人各有心吗？我和外国人拉扯，不过是为了学习外国语，通过交谈，可以让他给我正正字音罢了。”他如此好学，英文进步很快。一次，一位外国人来校讲演，世炎便主动担任翻译，而且译得很好。师生们既惊诧，又钦佩。许多同学特去访问，请世炎介绍学习方法，世炎也乐于热情帮助。

世炎各门功课成绩均优，并常阅报刊，注意时事，全不是一个书呆子。他雄辩于校中的几种“学会”，实践于校办的“国货制造社”与“国货售品所”，参加提倡国货，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著文于学校的“励学旬刊”。有一英文实习教员自己教错了，学生好笑，此人带头煽动实习教员罢教，世炎起而组织罢课，但尊重有学识的教师，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又凭他和其他同学的英语知识，有理有节地和学校当局辩论。终于制止了给学生记过的无理处置，获得了罢课胜利。这时的世炎，政治思想在发展。他著文指出：被奴役者才尊贵，而奴役人的“尊者”只是自命尊贵。道出了当时社会是分裂为“君子”与“小人”的对立的集团，寄同情于受奴役的“小人”。他在《三代非专制辩》一文中写道：

“古代民意机关公于众，今日民意机关萃于一，公于众者名实相称，萃于一者有名无实。”那时北洋军头子段祺瑞正利用召集国会的手段欺世盗权，不少人士受骗，中学生赵世炎的文章利用久受崇敬的“先王”、“三代”作战斗武器，戳穿北洋军阀御用国会的骗局。

在“附中”念书这几年，是世炎同志政治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特别是一九一七年，李大钊同志在物色优秀分子以筹组“少年中国学会”时，了解和分析了已在青年中崭露头角的世炎，便特地约会他。及此，世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他不负厚望，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成为联系各方面的核心人物。会员周太玄和世炎第一次见面，就为他的诚挚而英俊的气度，明智而有条理的见解所吸引，一谈就是一下午，深感他是“一把好手”。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那时公布这样的宗旨，已被认为是“过激”和“危险”。该会选择品学兼优的青年作会员。后来的事实证明，有的人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人物，有的则发展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有毛泽东同志和著名的先烈李大钊、赵世炎、恽代英、邓中夏等。一批致力于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运用这个组织，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活动。世炎在“高师附中”建立“少年学会”后，组织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消息与活动情况就传入“附中”，引起了高等师范当局的震惊，专门派了一个反动分子接任“附中”校主任，特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校演说，“提出“整顿校风”，无理开除了一个学生。世炎抓住这一事件，组织反击，一班先行，全

校响应，世炎以“少年学会为核心，团结全校同学，争取正直教师的支持，使高师当局无隙可乘，无词可籍，斗争历时一年，北京报纸作了报道，发了评论，终于击败了有强大后盾的对手，驱走了那个气势汹汹的校主任（这个反革命分子后来作恶多端，终于在一九五三年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判处死刑）。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世炎同志事实上参与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工作。“五·四”大游行示威前夕，世炎通知在“附中”的一位助手：明天将有大示威游行，应当即刻作好准备。那位同学问：何不把示威的时间公开告诉同学。世炎说：不妥，泄露消息，影响全局。那同学不以为然，认为“附中”同学可靠，世炎说：一要遵守大会纪律，不叫说时不能说，二要懂得敌人的惯技是攻破缺口，“附中”同学年轻，又为他人注意，绝不可做“一夫不慎累及全局”的事。那同学既愧服于世炎年轻老练，又怕不再被重视，但世炎却和他一起作了更详细的部署，使他既感到痛快又易于执行。还有其他同学，几十年后犹忆当年。游行示威前，“附中”同学已得到机密通知，即迅速作好示威准备。有的以为是由于“附中”教学水平较高，因而获得和北大等同的待遇；有的人多年后还以为他亲历的“五·四”运动大示威游行，是群众激于当时的义愤，自发性行动。岂知，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只有在群众普遍渴望斗争时才会发生，其爆发又须有先进人物有准备的点火引爆，象李大钊能够物色赵世炎这样一些刚刚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正是“五·四”运动的引爆者。“附中”同学投入示威游行，走上街头演说，与军警面对面斗争，因示威而被成批拘于天安

门内和北河沿“北大三院”过夜。“附中”大批同学及时有组织地投入斗争，正是准备充分的说明。运动爆发后三天，

“附中”组成全校同学会，世炎以全票当选为干事长，说明他在运动中显露了组织领导才能，是众望所归。

在思想异常活跃的“五·四”运动时期，世炎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除了投身运动的各种实践活动，还主办《少年》刊物，又是《平民》周刊和《工读》半月刊的主编。他的言论和文章，涉及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青年出路、男女平权等各个方面。那些进步刊物，切中社会时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那时，北大有一学生自杀，社会上议论纷纭，世炎抓住这一事件，揭露社会黑暗，他指出“社会不杀青年，青年必不自杀”，“非疯子的自杀，绝非自杀，实系被杀”。他大声疾呼：“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奋斗的方向是什么呢？他在《工读》半月刊创刊词中指出：“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这样的刊物，震惊了北洋政府，官方行文说《工读》“系以改革社会，反抗政府为旨，与现实风潮甚有关系”，“查该报持论，诸多谬忘，深虑影响时局，妨害治安”，云云，查禁了《工读》报。

世炎同志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封建、争解放、投身社会，成为一时风尚之际，资产阶级代表学者胡适企图阻挡汹涌而至的马克思主义，大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意在把青年引进象牙之塔去。赵世炎起而批判，戳穿这个新文化运动中风云一时的大学教授，胡适到赵家访问，一进门就见世炎奋笔疾书，便说：别写了，口谈罢。世炎给他倒了一杯茶，对坐下来就是一场持续的激烈辩论。

世炎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是一个组织家。他

在各种各样思想和主张纷然杂陈、莫衷一是的辩论会中，总是首先凝神倾听，然后才出来明析辩理，他思想敏切，谈话以理服人，往往是他一起立发言，就纷扰立止。事隔多年，亲历者回忆他这种娓娓剖析以服众，人们心服而乐从的情景，历历在目。“片言解纷”，正是一个卓越组织家的特征。

世炎同志平时待人平等诚挚，作风深入细致。有一件多年使人难忘的小事：有位“附中”同学，对世炎的一点疏忽有意见，写信投入学生会信箱，世炎看了信却不熟悉这位批评者，于是先后找了两位教师了解情况，然后登门拜访，并对批评表示感谢，与之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位同学就是夏康农先生。事后那位老师与夏谈起这件事时，很感慨地说：“世炎作事这样仔细不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才哩！”善于统一群众思想的才能，对具体人做具体工作的深入细致作风，使世炎同志团结了越来越多的人。他年岁虽不居长，但深得人心，以他的品德、胸怀与才智、被众人称为“及时雨大哥”。

“五·四”运动以后，反封建的号角震响全国，“个性解放”、“走出家庭”，“投身社会”、“谋求自由”，风靡一时，青年向哪里去？有些“五·四”时代也曾一显身手的人走进了官场，胡适之流则诱使青年回到静静的书斋，在社会革命的思想、政治、组织准备都还远远不够时，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倡导“工读运动”，世炎同志积极从事“工读运动”，主编刊物，参加“工读互助团”，他曾经组织一些学生去担任“平民夜校”教员，帮助一些青年从事抄写文稿挣钱求学，他还帮助了两个青年从北京赴上海，到“时事新报馆”作校对工作，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很快就

汇集到组织“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一九一九年秋末，世炎同志进了吴玉章主办的“北京法文专修馆”，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既学习又工作，十分繁忙，往往在学校一个小办公桌上过夜，他灰谐地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苦亦在其中矣”。（待续）

红三军司令部遗址

——南腰界余家桶子

冉 光 大

我县南腰界位于四川省东端，离县城九十九公里，乘西（阳）南（南腰界）公共汽车需要六小时才能达到。这里，是川黔六县（四川的酉阳、秀山；贵州的松桃、印江、德江、沿河）的结合部山区，这里千峰万仞，群峦迭嶂，绝壁峭立，道路崎岖，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道，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九三四年六月至十一月，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由湘鄂西转战川黔边，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那时的黔东特区，以南腰界为军事战略中心，在川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设立苏维埃政权。当年，红三军指挥机关——司令部，就设在南腰界余家桶子内。

余家桶子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是当地豪强余兰成所修。红军来到南腰界的前夕，余兰成的孙子余兴义（土豪）闻风潜逃。解放后，南腰界乡人民政府设在此处，一九八三年一月，省人民政府决定复修革命遗址，乡人民政府由此迁出。

余家桶子的明五（间）暗七（间）正屋和吊脚楼的两厢房，全都是石、木结构，屋内约四百五十多平方米。屋的两

侧是封火古墙，墙乃下石上砖所砌成，墙顶有三层长、短的檐角，乃青瓦所盖。角下面画有异草奇花，屋顶正中是喜鹊闹梅的图案。屋中堂是“天地君亲师位”余氏祖宗的香火。神龛下有一个大“福”字和两条雕龙，最引人注目。当年红三军司令部办公室就设在这中堂处，办公室陈设俭朴，仅有两张八仙桌、四把古椅、两条琴凳和一张军事地图。进屋右边是贺龙同志和他外甥肖庆云同志的住地；进屋左边乃谷志标参谋的寝室；在后屋的房间还住有参谋科、管理科以及警卫连的同志等。

走下正屋石梯，有一块石坝与花园连接在一起。当门左边是两扇木做的“八字朝门”，门下有石阶。正屋的四周用大石板 and 火砖砌成的高二米八，长二百七十八米的大围墙，它把整个房屋圈得紧紧的，形成了一个大的桶子。在外墙上，红三军书写有：“活捉冉瑞廷，替为革命而牺牲的工农群众复仇，消灭冉匪武装，武装工农自己”的大幅标语。在进屋右边的屋基上，还有四间木石结构的书楼。此楼，曾作过被俘敌人的囚室。

当年，红三军领导同志在这里，号召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在南腰界这块革命根据地上，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了有三百七十二人的游击队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五个，宣传了《十大政纲》，提出了“打富济贫”的口号，打了土豪四十余家，镇压了国民党乡长罗汝祥，劣绅罗汝操，击毙了龟缩在冉家祠堂内的土皇帝冉瑞廷的儿子冉崇侯（顽敌），争取和收编了神兵冉少波团的部队。

为了培养干部，为红军输送新鲜血液，红三军司令部在这里创办了红军大学，培训了一批红军干部和游击队的干

部。同时，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率领的红六军团和红三军在猫洞大田胜利会师。特别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司令部所在地召开了三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为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及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有力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纠正“左”倾错误，挽救革命，建树了卓越的功勋。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至四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司令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作出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的决议》。使坚持三年以上的错误肃反，迅速停止下来。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着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情绪，才开始消除。从此，广大红军干部和战士，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并细致地研究了党在川黔边之黔东特区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旬至十五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司令部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同志，对红三军（红二军团）的整个历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对湘西、鄂西、洪湖等地区的战斗历程及一九三二年开始的四次肃反经过，作了认真的分析和检讨，并对湘鄂西根据地的丧失教训作了认真的总结，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司令部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彻底纠正夏曦同志推行的“左”倾错误，巩固了黔东根据地。决定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二、六军团集中统一行动，成立总指挥部，由贺龙同志任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任政委，李达同志任参谋长，张子意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红三军司令部在战史上，闪耀着鲜艳

夺目的光辉。红军当年在这里播下的革命种子，已经开花、结果。新中国的诞生，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所取的辉煌成就，都与红军的丰功伟绩紧密相连。今天，红军当年在南腰界余家桶子设立过的司令部遗址，已经动工复修，慎终追远的中华儿女，代代都缅怀着革命先驱。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经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南腰界余家桶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在大坝场战役遗址

——冉氏宗祠

王明友 冉光大

冉氏宗祠，位于酉阳县南腰界西南八里许的大坝场。这座宗祠坐落在四山环绕的一个大坝子上，坝上田连阡陌，堰水长流，羊肠小道，崎岖难行，举目远眺，恰似海岛上的亭台楼阁，临其境，犹如军事上用的地堡石碉。它始建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冉氏子孙祭祀祖先吉祥之所。宗祠的建筑宏伟壮观，用砖、石、木结构建成。三间中堂高大，画栋雕梁神奇，堂中有冉氏祖先香火家龛，灵牌今已没落，中有四角天井，细钻块石现存。进屋有三间楼房相连，楼下有两间厢房左右对立。正大门是条石砌成，石柱上刻有：“报本追宗，千秋常崇祀典；慈孙孝子，百世不改薪传”的对联。横额上的“冉氏宗祠”匾额现遗失难寻。宗祠两端有五米高的封火墙，墙顶有两层青瓦檐角，奇花异草图案，至今还引人注目，宗祠近丈远的四周，有一百一十多米的大石墙，墙高三米，宽七十五厘米，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牢固防卫大圈，加上东、南、西、北四处，各有一碉堡瞭望前方。这座宗祠在战役中，可算是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四日，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进入南腰界后，在大坝场战斗中，采取了分化、收编、改造的政策，